



仕途末路
□主笔 记者 赵冉

拥有七情六欲,身处是非之地,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官员们,一方面要承受来自工作的压力,另一方面还要小心迎合特殊和复杂的官场规则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旦有官员自杀,“抑郁”和“压力”似乎成了官方通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,成了官员自杀最主要的原因。因抑郁或压力而自杀,是他们真的饱受内心煎熬,即便身处高位依然难以获得安宁,还是真像一些人质疑的那样不过是一块遮羞布,一死百了,不但可以帮他们逃避追究,还可以挡住所有的目光和脏水?

官员自杀 抑郁成第一杀手

无处不在的抑郁

2014年5月6日下午2点,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四楼,职员小陈正要最南端的楼梯间倒垃圾,忽然,楼梯间内一个飘荡的人影吓得他心肝俱裂,定神一瞧才发现,这不是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吗?
出于本能,小陈赶紧跑过去,抱着贺卫星身体往上用力,但套在贺卫星脖子上的绳子就是不出来。绳索打的是死结,绕脖子一圈,尝试几次没能成功后,小陈连忙叫来其他同事,这才解开脖子上的绳索。很快,当地120、110赶到现场,贺卫星已没有生命体征。

“曾经聊天的时候他抱怨过,很多曾经的下属现在混得比他好,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。”贺卫星的侄子贺明说。贺卫星上衣口袋里的遗书,似乎也暗示着这位看起来风光的副台长心中的隐痛:工作压力巨大,上班突感胸腔剧痛,痛苦不堪,无法忍受。警方还在贺卫星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笔记本,“痛、痛、痛,生活难、工作难”等字样格外刺眼。

“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,非常痛苦,不能吃睡,生不如死。”两个月后,原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,在办公室留下遗书后跳楼,结束了自己52岁的生命。

在同一年因抑郁自杀的官员中,张柏成和贺卫星的级别并不算高,但都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走上了不归路。记者统计发现,2014年前9个月,公开显示为因抑郁而自杀的官员或国企高管至少有10人,其中级别较高的有原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伍峰、原中铁总裁白中仁等。

去年因抑郁自杀者也不乏其人。2013年1月8日,原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,有关方面称其“生前身患疾病,有抑郁症状”;2月17日,原四川崇州市反贪局局长柯建国坠楼身亡,崇州官微称其“患有严重的抑郁症”。

此外,虽然一些官员自杀原因并未明确表述为抑郁,却也似乎有抑郁的征兆。今年4月8日上午,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其在办公室自杀身亡。据称,徐业安身体一直不好,最近几个月耳鸣,情绪也不好。

“抑郁”似乎已经成为官员自杀的一个常用标签。重庆《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》报告中称,34.5%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,其中重度占3.46%,中度占9.9%,轻度占21.30%;《人民论坛》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,发现80%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。

无比脆弱的心理

2014年1月4日,54岁的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身亡,这位来自黄河西岸农村的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,一直是家乡人的骄傲。

“挺可惜的,他4号上午还到单位工作,想不到回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他近年患上抑郁症,部分原因可能是公司债务负担重,个人压力大,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叹息,“有些局的

负债率都超过90%了,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前几天中铁旗下的中铁一局、中铁四局还组织人到中国铁路总公司要账,事情闹得挺大。”

有关媒体引述其家属说法称白中仁患有抑郁症,这也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证实。但对于王梦恕的说辞,中铁董事会秘书于腾群不认同,他对媒体说,公司的债务和风险是可控的,公司业绩亦在好转,并不存在负债过重的问题。

人们更愿意相信,白中仁的死与铁路系统第二波反腐浪潮来临有关。2013年下半年,中铁旗下的中铁隧道公司高管窝案“出柜”,原董事长郭大煊、总经理张继奎、总会计师裴广进同时被抓,白中仁是否能独善其身?

同样因为抑郁而跳楼的,还有原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,7月26日,他从湖北省政府办公大楼对面的湖光大厦附近跳下,之前写下遗书,其中有“我很抑郁,抑郁难忍,先走了”等字样。

虽然王运清试图以“抑郁”来自证清白,人们还是将他的选择和之前原湖北国资委副主任鲁力军、王侃被调查联系在一起。

中国公众对高级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最早认知可追溯到2000年,当年5月,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跳楼身亡,其自杀前正在“协助调查”一起经济案件,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抑郁症。

仅仅因心理健康问题自杀,有时很难让人们信服,往往一些所谓患有抑郁症的官员,都是腐败传闻缠身。相比其他自杀原因,抑郁症的解释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官员自杀引起的负面效应,但如此一来,抑郁似乎成了“万金油”,反复出现于官方通报之中。

当然不可否认,身在官场确实面对诸多压力,用“水深火热”来形容这个看起来神秘又让人神往的特殊职场一点都不为过,身处其中的大小官员,无不如履薄冰,无不“赴汤蹈火”。

无法承受的压力

当官并非一件轻松的事。官员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,令不少官员疲于应对,“领导责任追究制”,“一票否决制”,“绩效评比考核制”等,也使得官员恐于担责。

此外,网络舆论监督方式的转变、官员与百姓之间的隔阂等,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官员的工作压力。4月9日,奉化垮楼第六天,时任城建办公室副主任的何高波自杀,虽然事件追责并不一定会波及至他,但他在惴惴不安中煎熬许久还是选择了不归路。

“领导怎么说,我就怎么做”,“那些材料领导都过了目,认同了的,到现在却要我说清,百口难辩,硬是要我承担责任。”原湖南省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杨坪罗的遗书耐人寻味。

在前述《人民论坛》所做的调查中,64.65%的受调查者认为,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“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”,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、抑郁等问题,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,导致精神崩溃。



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自缢身亡。 资料图



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白中仁跳楼身亡。 资料图



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、党委书记刘亚军卧轨身亡。 资料图

压力太大 他最终选择卧轨自杀

广深铁路自广州东站出发均为全封闭路段,广州东站往东3.5公里处,瀚景路湖源农庄对面临近人行天桥处有一土坡,土坡顶端距铁路围墙仅30厘米左右,成年人很容易从此处进入铁路。

2010年6月24日下午,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、党委书记刘亚军,从这处土坡翻进了铁路,选择卧轨这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

一些民航中南局的内部人士,称刘亚军作为中南局一把手,上任不过一年多,“就因为压力太大而长

期失眠,黑发变成了白发,原来挺直的脊梁也弯曲了”,也有人称,加班对刘亚军而言是家常便饭。

“根据刘亚军的遗书以及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反映,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,总觉得休息不好。到广州工作以来,自感压力大,在家中有时独自哭泣。在整理其办公室时发现,他收集了不少治疗失眠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料,对一些症状的描述还专门作了标记。其家属也反映,他在家经常上网查阅这些资料。”《中国民航报》报道称。

延伸阅读 他们的最后一步 令人不胜唏嘘

选择了自杀这条充满绝望的路,他们的人生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: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?

盘点官员自杀的方式,不用任何工具,只需咬牙一跃的跳楼,成为“最受欢迎”的选择。

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白中仁、国家新闻办副主任李伍峰、湖南省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杨坪罗、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、四川崇州市反贪局局长柯建国、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张万雄等,都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相对于跳楼,自缢并不是一种痛快的死法,却不会像跳楼那样惨烈。

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、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、湖南省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、广东省清远市财政局副局长罗良品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原区委书记姜学全、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琳等,自杀时选择了自缢的方式。

割腕、割颈或以其他锐器自杀,相对而言要承受更大的痛苦,也更令人触目惊心。

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、四川青川县粮食局局长马晓东都是割腕自杀;

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被发现在办公室内颈部割裂死亡;

汉中市卫生局汉中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张琪,则系用锐器刺伤两侧腹股沟,造成腹股沟动脉血管破裂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
除了上面这些之外,其他自杀方式并不常见。广东省东莞樟木头圩镇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伟强,在办公室内烧炭自杀;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财政局局长谢东权服毒自杀;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长刘亚军撞火车身亡;河南新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志刚驾车冲入水库自杀。

湖北公安县纪委官员谢业新的自杀方式则令人费解。据称,谢业新身上共有11处刀伤,多处为致命伤,脖颈处共有4处刀伤,其中脖子有明显割伤,伤口长达17厘米,气管和喉管都被割断,胸部至腹部有4处刀伤,深至胸腔,左手手腕2刀,右手手腕1刀,右手腕肌腱、血管被割断。

法医鉴定书结论为,致命伤系胸骨上窝处刺刺致上腔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,公安机关确认谢业新系自杀身亡,警方称前10刀是试探。

本版稿件参考资料来源: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新京报》、财新网、人民网、《财经》等

河畔景苑(赵庄)
74平, 2室1厅, 阁楼 24万
送地8平, 房最矮的地方2.3米以上
电话: 13176661377

准现房
别墅 66万/套起
配套完善 证件齐全 双气三线
电话: 13021721095

宠物毛发、花粉过敏怎么办?
室内二手烟污染怎么办?
用365空气净化灯
效果看的见! 13153165009

更节能 更省电
太阳能采暖
空气能采暖
地址: 甸柳新村东路14-1号
电话: 13573167718

老万电暖炉
老万燃气炉
土暖改电暖
电话: 86560849